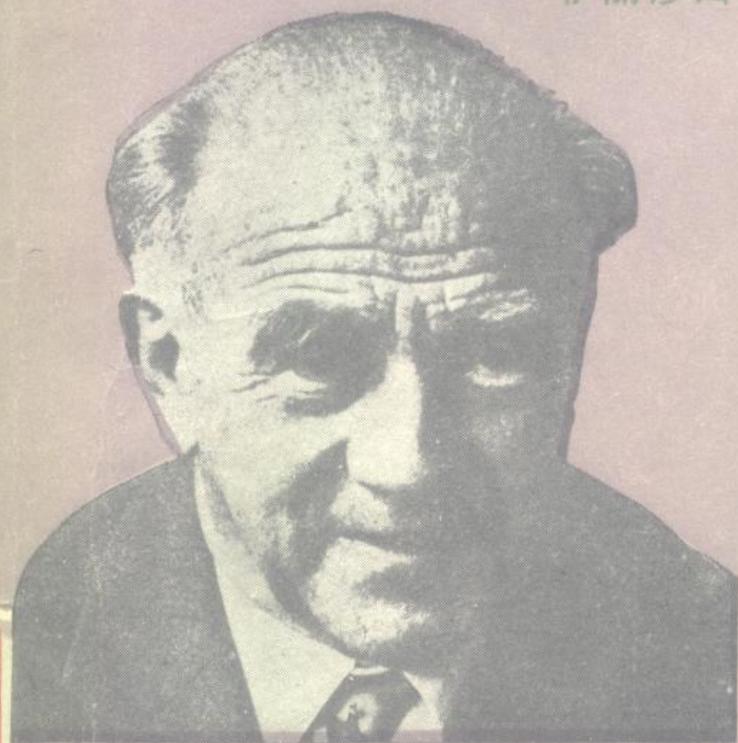


# DAS POLITISCHE LEBEN EINES UNPOLITISCHEN

伊丽莎白·海森伯 著  
王福山 译



## 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

# 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伊丽莎白·海森伯 著

王福山 译

---

D531/12

复旦大学出版社

---

**Das politische Leben eines Unpolitischen**  
**Erinnerungen an Werner Heisenberg**  
**Elisabeth Heisenberg**  
**R. Piper & Co. Verlag, München Zürich 1983**

**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

**伊丽莎白·海森伯 著**

**王福山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39 千**  
**1987 年 11 月 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309—00013—7/G·03**

**统一书号：7253·022 定价：1.40 元**

## 内 容 提 要

海森伯是德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提出了测不准关系，并对物理学的其他前沿工作都作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是，由于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留在德国，又参加了德国军部的原子能开发工作，世界舆论对他颇多指责。其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所写的本书，正是要阐明他所以会被迫登上政治舞台，以及所以会形成他的政治思想、态度和行动的前因后果。

1954年11月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

论 维尔纳·海森伯：

他首先是天生的人，其次是卓越的科学家，然后是一个近乎具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而第四才是出于责任感的“政治人物(homopoliticus)”。

**作者简介：**伊丽莎白·海森伯，娘家姓舒马赫，1914年生于波恩。1931年在柏林一所中学毕业后，从1934年起在柏林和弗赖堡大学读历史、美术史和德国文学。1937年在莱比锡开始她的书商学习期，不久就在那里同维尔纳·海森伯相识，并同他结婚。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她对教育和发育心理学等问题在理论上极感兴趣。她在成人教育范围内把她的经验通过作报告而传授出去。在她丈夫故世后，她开始接受当呼吸治疗医生的训练。

## 译 者 序

三年多前，因为要了解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原子能工作，我曾写信给三十年代我在莱比锡大学的两位同学和朋友埃里希·巴格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先生，提出两个希望回答的问题，他们都参加过这项工作，应该是知道的。他们都给了回信，并寄来一些资料，尤其冯·魏茨泽克先生附来打字复印的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为伊丽莎白·海森伯，即海森伯夫人回忆其丈夫所写一书的英译本引言供参考。这才使我知道有这样一本名叫《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的书，很想一睹为快，但苦于得不到它。

一年后，同济大学物理系波耳固体物理研究室受委托举办一个“布里渊散射”培训班，请来西德弗赖堡“夫琅和费应用固体物理研究所”W·韦特林(W. Wettling)教授和苏黎世RCA实验室专家英国人J·R·桑德科克(J. R. Sandercock)博士。在同W·韦特林教授的广泛交谈中，他了解到我很想看到海森伯夫人的这本书，就许诺回国后一定给我寄来一本，这自然使我既感谢又高兴。

书寄来后我先翻阅了当时感兴趣的一些段落，后来才从头至尾阅读一遍，觉得作者以她特有的条件对海森伯的一生写得很详实，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在纳粹政权下的遭遇，以及他所以要留在德国不愿出走的原因等等，都讲得淋漓尽致。这些资料非一般人所能洞悉，我决意把本书译出，想必一定有助于对海森伯其人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对他各方面的评论能

做到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而不致失之偏颇。譬如说，他留在德国不走，是不是如今一般所说要为希特勒卖命，以维护其残暴统治；又如他参加原子能工作，是不是如今一般所责备他的要为纳粹德国制造原子弹，以打赢这场罪恶战争。我认为，如果不是只从外表粗略一瞥，而能深入研究，加以具体分析，说出其所以然的特点，道人之所未道，又能设身处地替人想一想；那末，对一个人的评价，不管肯定还是否定，一定会因比较客观而做到公平、合理，也会由于避免陈词俗套而更有说服力。

我把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为本书英译本写的引言作为附录放在正文后面，一则因为我是从德文原版翻译的，而原版是没有这篇引言的；再则我是根据冯·魏茨泽克寄给我的英文打字复印本译的，我没有看到过英译本其书[据说英译本名为《Inner Exile》(国内放逐)]，故不知最后印出的引言是否与这份打字复印本完全相同<sup>①</sup>。但无论如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以先读这篇附录作为引论，也可以放在最后为本书读后回顾提供一些思考和总结。

书最后附有人名索引，并给每人写上必要简历。作者虽说有些人因找不到资料，只好仅列其名，但在我看来，其中部分人物，特别是德国当代政治家，如阿登纳、勃兰特等等，因对德国读者都熟悉，只要列个名已足。但是，对我们则不然，我们对他们并不熟悉，所以我参考有关辞书补上一些，想使人名索引比较齐全一点。

还有一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忠于原文。但是因各

<sup>①</sup> 在本书排印期间，感谢华中工学院杨建邨先生复印寄来了这篇引言的最后印刷文本。经核对，除两处稍删增一二句外，其余几乎没有变动。现均已照改，唯有一处，即原来说海森伯家庭有七个孩子，现为六个，由于其他资料都说有七个，故未予更改。

国文字表述方式不同，造成一些困难；有时则又难免一时疏忽，造成理解错误。凡此种种，均希读者不吝指正为幸。对于在翻译中给过我帮助的友好，我都表示深切感谢。同样，我也十分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做的工作。

最后，今年是海森伯逝世十周年，我也将以这译本来表示对他教诲的崇敬和怀念。

王福山

1986年8月于复旦大学

## 前 言

1977年春，我同大约25位接受洪堡奖学金的学者，周游了一次德国。这样一种旅行，是亚力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基金会提供给世界上50多个国家来到德国工作和继续他们的学习的年轻科学家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工作的期间了解一下德国情况。对于这次旅行，我曾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担负起带领这组奖学金领取者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因是一次同他们的最令人愉快的会见而变成了我的一次最难忘的经历。在这三个星期的旅行期间，自然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德国的过去及其不幸历史的交谈。可是我毕竟属于那一辈的人，他们必须忍受这个苦难时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必须对它负有一定责任。用不了多少时间，这种谈话也就转到了这样一些问题上去，如我的丈夫维尔纳·海森伯在所发生的这些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为何没有流亡到国外去。这些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心。然而在这关心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我丈夫的作用的各种不同的、一部分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想法，使我意识到，这些想法是多么含糊不清，多么曲解，甚至往往是实在错误的和自相矛盾的。于是在我心中就开始产生了一个意念，想把我在这方面所知道的都写出来，并且把维尔纳·海森伯的形象，像它在我和他一同生活所度过的那些岁月里、并在这些岁月里深入的思想交流中和他一起所产生而今仍活跃在我内心中的那样，勾划出来。我打算把海森伯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国家的罪

悉历史如何迫使他作出与它争论的情况，都描述出来。这不是要给他美化渲染，他的弱点，甚至错误，我也不想隐瞒——但是从我的记载中也应该体现出，海森伯是以何等坚定不移的、合乎逻辑的行动和正直的性格度过他的一生。所有和他曾经接触过的人都了解这一点。

我想做这个工作，是得到了海森伯的一位朋友和同事的鼓励。这位同事当时因为要躲避纳粹刽子手的迫害，不得不开他的国家，逃亡到了美国。他对我说：“对，你要写！只有你能够把海森伯这个人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这个形象和海森伯作为世界上指明方向的科学家所具有的形象结合起来，可以令人信服地组成一个整体。”这些话给了我果真要写这个记载的勇气。这里所要讲到的，主要是对海森伯的、包括他给我所说的、对我们共同所经历的、以及对一些由于它们的特别爆炸性而仍然非常清楚地留在我记忆中的交谈的一些回忆。有时我也借用其他人对他所作的报导，有时也追溯到 he 后来所写的信件。但是，如果人们抱着这种期望，以为我或许会在这里有什么新的证据、确凿的文件提供出来，现在可以用来给海森伯的形象添上非常明确的和完全新的几笔，那就错了。情况并非如此。用了这几句话，我就已经接触到了一个基本的困难问题。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往往没有受到人们的真正注意，而且有时确实也被低估了，可是它却深深地与当时局势相联系着的。一个人不敢把他的政治感受和思想——恰恰在它们与官方的观点相反的时候——清楚地说出来，更不要说敢于用书信或日记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而不会拿他的生命或者他的自由去冒险。这种情况，说到底完全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的本质。这就使我们很难对每一个在纳粹统治下生

活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不含糊地掌握他的真实历史和识破他生活和行事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对他产生陈规俗套的想法，和不加批判地作出一般性的结论。

对于所有从未一起经历过这个时期而只是从别人的回顾，或者通过其他人的报导，或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些的人，我这些话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疑，好像我要隐瞒什么或者想加以美化似的。现在他们已了解这整个过程；他们只要一想起那个时期，发生的那些事的残酷现实就会出现在他们眼前。事实上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难想象当时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也不知道在这种组织得如此完善的暴虐和欺骗的制度下，用了它有目的的谎言和充满这样恶毒的恐怖，一个人是怎样度过他的日子的。从我们现在的生活出发来看，对那些不同情这个制度，不愿与它发生任何关系而且是不肯完全屈服的人，该为他们如何活命作出什么样的一幅图像？然而即使恐怖和惊慌压在我们大家头上，生活还得过下去。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尽可能把自己掩饰起来，即使与熟识的人和不常见的朋友交谈，也总是小心谨慎，只用些影射暗示之词。谁能知道，话要被传到哪里，在它后面又要加说些什么？如果所要说的没有被人正确理解，那末就会引起这种毛骨悚然的、抑郁的缄默，而这个恐惧可能要久久卡在人的喉咙里。这恰恰是纳粹所用方法的恶毒之处，用散布恐惧和猜疑来毒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直至这关系的最亲密一层。这种一言不发的、不信任的缄默，这种不愉快的、难于接近的相互关系，成了这个时期的特征。

但是如果要把他的政治思想、情感或者主张用文字固定下来，那不知要更危险多少倍！所有在今天能够提到的海森伯

在政治上对纳粹不含糊的敌对态度，在那个时候——如用书面文件写下来——可能要丢掉他的头颅和生命。在这点上海森伯是完全清楚的。他是谨慎小心的；他毕竟不是为了作为殉难者去死而留在德国。他不愿死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谋杀之下，他要为他的生存斗争。他的理由和动机以后将会谈到。所有这些，除了他生命本身之外都是不存在任何其他可以作为海森伯政治辩解的证明的原因。

当然海森伯在那个时期写的信，也有政治方面的内容，并且还经常表示出他的忧郁和绝望的精神状态。这样一些信是他有时写给他在慕尼黑的老师阿诺尔德·索末菲 (Arnold Sommerfeld) 的，也有有时写给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的。但是，这些信也总是只能看作纯粹是一种私人的书函。在这些年里他同索末菲甚至有一段时间的信札来往，谈的是科学政策的灾难性路线——对这路线他完全清楚地说出了他的意见，可是他在这里也避免了任何一般的表态。海森伯深信不疑，他的信受到监视和审查。因此，往往在一句句子上他要琢磨很长时间，以使句中能包含他所要诉说的意见，又没有人能够用这些话来陷害他。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读一封信，在它的表述上他开了一个愤怒的玩笑，因为他知道，信监识破不了，而收信人却能完全理解所指的是什么。但是即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还是很难从这些信件中看出海森伯的真正的政治见解，因为它们正是作为信来构思的！

所以我在这些记载中不能提供比之我的回忆和他一生的内在一贯性和一致性更多的东西。这个内在一贯性和一致性，在我撰写它们的时候，越来越强烈地和迫切地在向我倾诉衷情。对于它们我寄予希望，希望它们有力量能够出来为自

已作证。

海森伯的好多朋友不同意我做这个工作。他们认为，所有必要的东西海森伯在他《部分与整体》这本书中都已说过，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态度。所以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工作？如果有人想知道，在我们这个复杂世界的迷宫里海森伯是以什么为向导的，那末可以去读他的这本书。然而我在这里要写的，是与海森伯曾经写过的不同的另一种东西。海森伯是怕羞的，他完全不可能谈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也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他小心谨慎地提防他的个人作用公之于世，这就是所以在他的自传里——实际上他并不把它看作是这样一种自传——只是非常含糊地并且极不完整地报导了他个人。海森伯在他书里就是不写他自己，而写他对科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他在书中阐明的是这些思想如何形成的，从哪些源泉吮吸得来的。书中文字是这位思想家所经历的整个一生的精练提要。但是关于他本人，以及他的内心矛盾和问题，我们从中了解得很少。在他看来，重要的只在于把凡是认清了是正确的东西传授开去——这在他所写的各本书中都是这样做的。至于他自己，则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不足以给自己大肆吹嘘。因此，在他书里就留下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引起了不少人对他的为人的许多错误推测和不符合事实的判断，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兴趣，使他的形象不寻常地摇摆于崇敬和批评之间，以致有一次当海森伯为此而稍感不安和六神无主地请教他一位朋友，荷兰的亨德里克·安东尼·克拉默斯 (Hendrick Antony Kramers) 教授时，这位朋友对他说：“是啊，海森伯，你倒对你的席勒 (Schiller) 很熟悉，在《华

伦斯坦的阵营》<sup>①</sup>序曲里他不是写道：

为党派之爱憎所淆乱着，  
他的性格在历史上苦无定准……”

他还加上一句：“你也将这样步入后世！”而后他们愉快而微笑地又分手了。

我把我的这些记载联系在海森伯书中剩下的“留下部分”上，讲他的形象，讲维尔纳·海森伯其人，讲凡是与他接近的都喜爱的这个人，讲这个自己肯定他一生而能以极大安详与它告别的人。然而，这个工作也只能对他的形象提供很少一点补充，可总是还有一大部分剩余下来。这余留部分总将残剩下来，因为很难把他多层次的形象都描写出来。我在这里只讲海森伯是如何对待这种如此敌对地闯入他生活的政治。这个同政治的争论完全不可避免地决定着 he 生活的一大部分，同时也充斥着除他的科学之外的他的思想世界。但是为了便于理解他的政治行动，我们必须稍为广泛地环顾一下他的周围事物。因为在这个环境中他的性格得以生根，从这个环境里他的政治见解得以产生、成长乃至成熟。因此，我也要

① “华伦斯坦的阵营”是德国诗人席勒著作《华伦斯坦》诗剧三部曲的第一部分（其余两部分为“皮柯乐米尼父子”和“华伦斯坦的死”）。《华伦斯坦》是一部以欧洲三十年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剧。主人翁华伦斯坦（Wallenstein）确有其人。他本是出身微贱，是一个领主的一位小臣，因为性格夸大，富有冒险性，乘着战争的风云便暴发了起来，由伯爵而公爵，执掌了奥国的兵权。到了这样位极人臣的地位，他终于起了野心，觊觎天位，图谋不轨。然而失败了，遭了杀身之祸。

诗剧第一部分“华伦斯坦的阵营”在文学的意义上讲来，是最初的群众剧，那里没有主人翁，只是一些佣兵的群像；作者借那些佣兵来把华伦斯坦的时代背景形象化了。

这里几句译文录自郭沫若译《华伦斯坦》一书（194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第7页；后面在本书第7页上所引几句的译文则录自该书第38页。——译者

讲他的童年，他父母的家庭、朋友、音乐和他热爱的国家。这个国家，依照他的看法，比之所有他在世界各地旅行中所见到的更美，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属于这块土地的，在其上有他的根的。

## 关于资料来源

当然，不是所有我在本书中记下的都能从我的记忆和从书信中得来。我要感谢汉斯·巴尔赖希 (Hans Ballreich) 博士先生，因为他给了我许多有关重建威廉大帝学会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资料。他从事于这学会的历史研究，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且在好多信中给我提供了许多他在这方面的知识。

再则我从阿尔明·赫尔曼 (Armin Hermann)<sup>①</sup> 的书 中采用了一些事实，有一二处是从他手稿中摘录下来的。这批手稿后来经他压缩删减而以《世纪科学》<sup>②</sup> 一书出版。引自阿尔布雷希特·施佩尔 (Albrecht Speer) 的引文则取自他的回忆录<sup>③</sup>。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报导我摘自约斯特·赫尔比希 (Jost Herbig) 的《链式反应》<sup>④</sup> 一书。在美国，我阅读过塞缪尔·哥德斯米特 (Samuel Guodsmitt) 写的《阿尔索斯》 (Alsos)<sup>⑤</sup> 一书，和莱斯利·R·格罗夫斯 (Leslie R. Groves) 将军<sup>⑥</sup> 写的书的有关段落，此外还有A·D·拜尔兴 (A. D. Beyerchen) 著的《希特勒下的科学家》<sup>⑦</sup>，然而我没有从这本书中引用什么。

摘自海森伯本人的那些引文，则出之于他的演讲集<sup>⑧</sup> 或者他的书《部分与整体》<sup>⑨</sup>——要不然取之于他的信件。所用的冯·魏茨泽克 (v. Weizsäcker) 引文，一部分也来自他未发表的讲话<sup>⑩</sup>。

对于所有在本书撰写的三年中曾经给过我帮助的人，鼓

励过我不使它埋藏在抽屉角落里被人遗忘的人，我都表示深切的感谢。其中首先要提到在纽约柯朗 (Courant) 研究所的内莉·弗里德里希斯 (Nellie Friedrichs) 和库特·弗里德里希斯 (Kurt Friedrichs) 夫妇，我同他们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对底稿进行了讨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达维德·纳赫曼佐恩 (David Nachmansohn) 教授，他增强了我决定把这工作变成一本书的信心；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维克托·魏斯科普夫 (Victor Weisskopf) 教授，同样还有像耶路撒冷的本·开达 (Ben Kedar) 教授，他们都鼓励我写这本书。

此外，我也要感谢我的代言人冯·魏茨泽克教授和赖默尔·吕斯特 (Reimar Lüst) 教授，以及最后还有海迪·博内特 (Heidi Bohnet) 博士夫人，我同她双方都以极大的喜悦把底稿再次通读修改一遍。没有所有这些帮助，这本书是决不会成熟起来的。现在我把它推向世界，让它像一条船下水一样，去迎向它自己的命运。

伊·海·

1980年5月于慕尼黑

注释：

- ① 阿尔明·赫尔曼：海森伯，赖因贝克 (Reinbeck) 1976。
- ② 阿尔明·赫尔曼：世纪科学 (Die Jahrhundertwissenschaft)，斯图加特 (Stuttgart) 1977。
- ③ 阿尔布雷希特·施佩尔：回忆录 (Erinnerungen)，柏林 1969。
- ④ 约特斯·赫尔比希：链式反应 (Kettenreaktion)，慕尼黑 1976。  
[中译本：原子物理学家的戏剧，北京 1983。]
- ⑤ 塞缪尔·哥德斯米特，阿尔索斯 (Alsos)，纽约 1947。
- ⑥ 莱斯利·R·格罗夫斯：现在可以说了 (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纽约 1962。  
[德译本：Jetzt darf ich sprechen.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A-